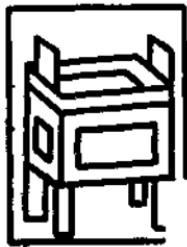


蒙古文



海拉尔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海拉尔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海拉尔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拉尔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五月

序

卜永和

《海拉尔文史资料》第五辑的出版，适值海拉尔建城261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岁月悠悠，世事沧桑，在这部史书里记载着勤劳、勇敢、淳朴的海拉尔地区各族人民为建设家乡而勤奋开拓，与苦难岁月英勇抗争的经历。跨越漫长的时空，今日的海拉尔市，正挣脱历史的禁锢，在改革开放中崛起。

海拉尔市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腹地，地处兴安林海西麓，是呼伦贝尔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岭西的商品集散地和交通枢纽。本市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二十多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这里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自然风光，酿成人们永久的记忆。

海拉尔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代北方剽悍骁勇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被称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明朝曾设置海刺几千户所，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始建城。这里历史上商贾云集，是北方的贸易重镇，地理位置险要，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史事资料蕴藏丰富。1905年被辟为商埠后，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封

建势力的不断摧残中谋生存，在内忧外患里求发展，至1932年12月初，海拉尔沦陷于日本侵略者手中，致使生灵涂炭，灾难深重。为驱逐黑暗，拯救苦难的各族人民，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进驻海拉尔市，人民得解放，各项事业才开始发展。抚今追昔，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海市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流砥柱。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自1959年周恩来总理首倡以来，海拉尔市的文史工作得到有关领导和各方面的鼎力相助，文史办的同志本着以史为鉴、以史育人、以史服务于现实和将来的宗旨，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工作方向，不辞艰辛，奔波于本市内外，采访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者，去芜存菁，至今编辑出版了近百篇文史资料。这对于保存历史遗产，发展文化，加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都有所裨益，对于教育今人和启迪后人具有着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如春风化雨，给海拉尔市这片沃土注入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使这边陲城市呈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昌盛，令人耳目一新的一派现代化景象不久必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1995年4月22日

(作者系中共海拉尔市委书记)

了解历史雄才
用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

中共海拉尔市委副书记
政协海拉尔市委员会主席

题词手迹

一九九五年 张永生題

目 录

序 卜永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专 题	呼伦贝尔盟著名的爱国者和杰出 的少数民族领袖凌升 原世文 (1)
	一九三二年海拉尔、满洲里 抗战始末 苏炳文 (11)
	凌升先生生平简介 阿·恩克巴图 额尔很巴雅尔 (27)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犯下 的罪恶 刘 肆 (43)
史 料	回忆在海拉尔日本宪兵 大队的痛苦遭遇 王兴武口述 李树发整理 (49)
	一九四五年苏、日两军在海 拉尔市的激战 任国芳 (54)
	郭佩璜及其《松涛》 杨季生 (62)
人 物	附件——海拉尔的第一面 五星红旗 郭佩璜 (66)
	清代名将——海兰察 崔广域 (70)
	春 秋

工 商	旅蒙商春秋	何德权 哈尔其嘎 (78)
	永发魁百货店	刘俊卿 (102)
	瑞隆丰靴鞋店	刘俊卿 (104)
	海拉尔市的铜铺业	何方 (108)
史 事	海市国营商业四十七年	杜春鹏 (110)
民 族 宗 教	海拉尔市的清理教和家 礼教	沈周乐 (117)
城 市 变 迁	海拉尔城的建立	朱巨祥 (132)
	哈 克	王 群 (135)
	南 屯	阿·恩克巴图 (137)
资 料	关于建立国营牧场的 两次决定	鄂耀胜 (139)
	海拉尔市归国华侨联 合会	李 元 (143)
	海市人民声援抗美援	
	朝纪略	杜春鹏 (146)
简 介	“八·一五”前后海拉尔	
	邮电局情况	张玉田 (150)

呼伦贝尔盟著名的爱国者和 杰出的少数民族领袖凌升

原世文

凌升，1886年生于呼伦贝尔索伦右旗达斡尔族莫日登丁氏人，名福贤，字云志。其父贵福，曾任额鲁特旗总管、呼伦贝尔副都统等官职。凌升属名门望族，自幼聪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精通满汉两种文字。年轻时正值清末民初的内忧外患之际，他立志报效国家，保土安民，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民国时期，凌升历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帮办兼额鲁特旗总管、黑龙江省公署咨议、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疆经略使公署顾问、北京中央政府咨议，是当时呼伦贝尔地区民族上层人士的重要代表，在政界中很有名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凌升性格倔强，敢做敢为，他在处理国事中，十分重视民族关系和地区特点。所以，他既得到广大各族人民的拥护，又由于他抵制日本人的殖民政策，早已被日寇视为眼中钉。

远在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便扶植清皇族肃亲王，组织了以复辟清朝为目的的“宗社党”，积极策划由日寇操纵的傀儡政权。早已充当日本鹰犬的巴布扎布乘机也参加了这一阴谋活动。但受到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和

他的助手凌升等人的反对和抵制，致使日寇的阴谋破产。巴布扎布死后，日本人又扶助巴布扎布的残系“副统领”色布精额，率领二千余人，于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春攻占了海拉尔。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在副都统胜福和车和扎的指挥下，年轻的凌升等组织了蒙旗联军讨伐，把色布精额匪帮驱逐出呼伦贝尔边境，致使日本人的阴谋化为泡影。

一九二九年冬，中东铁路事件爆发，东北军与苏联军发生交战。后经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议。苏军撤退前，苏军驻海拉尔的司令员与凌升秘密商定：一旦苏日发生战争，呼伦贝尔向苏联靠拢。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后，凌升被委任兴安北省省长。国务院兴安局参与官菊欣××（日本人）曾向凌升质问有无此事。被凌升一口否认。后来，日本人考虑到此事发生在“九·一八”前，而更为重要的是，伪满洲国刚刚成立，拉拢凌升孝忠日本是头等大事，所以此事又暂时搁置下来。

“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10月 东北军将领、黑龙江省哈满护路军司令、呼伦贝尔镇守使第二旅长中将苏炳文，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向全国发表通电，坚持抗战。凌升积极响应，并用实际行动予以支援。后苏炳文率部退入苏联境内时，给凌升留下了两挺机枪、45支步枪和数万发子弹，并赠予凌升一幅亲笔写的“铁血救国”袖章。凌升将枪支弹药存放在旧副都统衙门里，并未移交给警务厅。

凌升的妹夫春德也同情苏炳文，为苏炳文抗战的事他还给蒋介石发过密电。他们的这些举动，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严重注意。

日本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接着便炮制了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方案。这时，凌升一时没有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因而对日本存有幻想。企图依靠日本人的势力，摆脱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以保存内蒙地区的地方势力。因此，他参与了建立满洲国伪政权的全部活动。满洲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兴安北省省长职务。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便加紧推行它的旨在吞并我国东北的“大陆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都委派了日本人掌握实权的官吏。如，满洲国国务院下设的总务厅长官制，各部设次长制，各省设次长制（兴安四省设参与官制），各县设副县长制，各旗设参与官制。上述这些官职都由日本人充任。这些人名义上是“辅佐者”，实际上都是发号施令者。从国务总理大臣，到各部总长，各省省长、各旗县长只不过是傀儡。这些日本人是太上皇，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在这种情况下，凌升逐步看清了日本人的本质，他决心不当傀儡，极力维护当地各族群众的切身利益。采取重牧方针，实行有效地保护牧场和林业等措施，在行动上抵制日寇对中国的殖民统治政策。最多把日本参与官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不对日本人唯命是从，逆来顺受。而对日本人坚持己见，分庭抗礼。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都不听，所以他被日本人视为“不老实的人”。

伪满洲国成立不久，日本人为笼络人心和进行奴化教育，1932年10月组织满洲国伪政权的官员到日本观光，凌升反对

参拜各地的“天照大神”神社。他说：“我们参观目的是为了逛逛名胜古迹，欣赏风景，不是为了参拜天照大神而来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们拜他有啥用。”这件事，足以表明他的民族气节。

另一件事是，满洲国成立后，汉奸、蒙奸等，争先恐后，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学。而凌升却把自己的唯一儿子色布精太送往哈尔滨铁路法政大学学习俄语。这同样反映了他对日本和苏联的截然不同态度。

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之后，接着伺机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所以，自1921年起，日本人曾多次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支持上层反动喇嘛进行颠覆活动，从外部资助白俄反动军官温甘仑男爵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但却遭到了失败。1935年1月又蓄意挑起了“满”蒙之间的边界冲突，即“哈拉哈庙”事件。于是，边境武装冲突接连不断，并日逐加剧。由于日本在军事上遭到可耻失败后，被迫坐到谈判桌上来，于是双方协商于1935年9月在满洲里举行谈判，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1935年的“满洲里会议”。

应当说，“满洲里会议”是表明凌升政治立场的一次极为关键的时刻。

“满洲里会议”的中心就是为了解决哈拉哈庙的归属问题。参加谈判的是伪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双方代表。代表组成情况是：

伪满代表有：兴安北省省长凌升（首席代表），兴安北省警备司令官乌尔金（当时少将军衔）、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神吉正一、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斋藤正锐（会议期间伪

称政府官员)等四人。随员有：外交部驻满洲里办事处官员(日本人)、蒙政部事务官正珠尔扎布(日语翻译、联络员)、海拉尔警察署科长(后任兴安北省警务厅长)春德、秘书官华林泰、兴安北省警备司令部嘱托猪口三藏(蒙文翻译、联络员)、兴安北省警备司令部翻译额尔很巴雅尔(会议记录员)等十余人。

蒙古方面代表有：外交部次长桑布(首席代表)、东部边防军军团长丹巴(中将)、政府委员多克索本、随员其米德多尔吉等共十几人。

会议的主题是“哈拉哈庙归属问题”。但正式会谈后，日伪方面撕毁了协议，提出除会谈哈拉哈庙问题的归属以外，也可以商谈其他问题，结果遭到蒙方拒绝。日伪方面企图用武力压服对方，因此会议期间又悍然提出了一些无理要求。结果，哈拉哈庙一带的归属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十一月，会谈以决裂告终，日本人的阴谋遭到失败。

会谈期间，凌升是首席代表，但没有自由发言权，发言内容需由日本特务机关长斋藤正锐决定。凌升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鹦鹉学舌，并提出异议与斋藤发生争辩。本来，关东军企图通过凌升窥探蒙方动态，以拉拢蒙方代表，然凌升不为所动。为此，关东军指责凌升不为日“满”效力，心无诚意。

会议期间，正值日本代表山本五十六海军少将出席伦敦裁军会议归来路经满洲里，驻满洲里日本领事和凌升联名在满洲里车站食堂设宴欢迎。宴会要开始时，凌升发现日本领事的位置是主人的席位，而他的席位确排在次位，因此，他拒绝参加宴会，日本领事解释说：“请的是日本代表，日本领事应

该坐主席的位置。”凌升说：“请的是日本代表，但是这个地面（指满洲里）是属于兴安北省管辖范围，我是这省的省长，客人到了我的管辖地方，应该省长我坐在主人的席位。”两人争执了一番，日本领事无奈，只好把主人席位让给凌升。

1936年3月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会上，凌升针对日本对“满”的“国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反对从日本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移民计划；反对将日语作为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划为兴安四省分而治之”等一系列殖民统治政策。

综上所述，在“九·一八”前后，由于凌升的爱国言行，构成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呼伦贝尔地区推行殖民政策的重大障碍，为了拆除这个障碍，日本帝国主义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向凌升为首的爱国人士、少数民族的上层领袖伸出了毒手，以“通苏通蒙”的罪名逮捕了这批爱国者，并杀害了凌升等四名主要头面人物，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凌升事件”。

三

日本关东军已决定逮捕凌升等人，为防止地方势力的反抗，先将凌升有官位的亲属和得力助手拘押起来。

1936年4月12日，日本驻海拉尔骑兵集团长笠井中将宣布海拉尔和南屯（当时是索伦旗分署所在地，现在的鄂温克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托海镇，海拉尔市南9公里处）、西屯、莫和尔吐屯戒严，命令宪兵和军队戒备巡逻。特务机关长松崎直入大佐、兴安北省警备军顾问寺田利光大佐和海拉尔

宪兵队长北川宪兵中佐召开司令部会议，传达了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逮捕凌升以下蒙古要人，随即在全市进行搜查。被拘捕的有：

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凌升胞弟福龄、兴安北省省公署会计课长葆定、新巴尔虎右翼旗警务课长拉玛迪、新巴尔虎左翼旗警务课长春海、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尉倭林泰、兴安北省警备军骑兵第七团上尉团副沙德拉图、兴安北省省公署总务厅长荣安、总务课长双海、海拉尔市政管理处长春德（凌升妹夫）、索伦旗旗长恩明、索伦旗行政课长额尔很巴雅尔（曾参加满洲里会议）、满洲里办事处处长尤登布、海拉尔和满洲里及扎赉诺尔的警察署长等，共拘捕二十余名军警政各级官吏。

4月14日，凌升和华林泰（凌升秘书兼日语翻译）在新京开完“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后返回海拉尔，在车站被日本宪兵逮捕。凌升被捕后，数十名日本宪兵包围了凌升住宅，进行了大搜查，除了金银货币以外，并未搜出什么“通苏”“通蒙”的“证据”。只是在旧副都统衙门的仓库里搜出了苏炳文送给他的枪支弹药。

被拘捕的二十几人中，主要是凌升、春德、福龄、华林泰四人，这四人开始被关押在海拉尔监狱，受到残酷的审讯，结果，谁也没有承认日本人罗列的罪状，也没有连累其他人。由于案情重大，不久把这四人押解到新京。在新京的军事法庭上，四人表现得异常坚强，没有承认任何罪行，日本人无奈，以“通苏、通蒙、反满抗日罪”于1936年4月末在新京的南岭被处决。

日本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将凌升被杀的事，进宫向溥仪进行了报告，说这是“杀一儆百！”溥仪听

了后，想到自己的处境，终日惶惶不安。

据当时目睹行刑情况的伪治安部官方长官江上校回忆说：“这人（指凌升）真倔强，临刑时面不改色，含着冷笑。叫他带上蒙面时，坚决不带，挺着腰板不在意。问他还有什么说的，他说：“没有，快打吧！”被拷问时，始终没供出任何通苏事实，只说：“别人无罪，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都是我一个人担当，不要牵扯别人。”

虽说此事当时轰动一时，报纸上也进行了发表，但无具体事实，所以至今查无线索，足见“凌升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镇压中国爱国者的阴谋事件。

四

凌升的出生正值清末民初时期，作为旧中国的官僚政客，中国少数民族的上层代表人物，目睹了旧政权的腐败无能，任外族侵略摆布，国土沦丧的客观事实，他的爱国之心油然升起，代表着整个呼伦贝尔和东北三省各族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的切身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生命的危险，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抵制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利用兴安北省省长的合法身份，进行公开或秘密地抗日活动。在政治上，他倾向革命，热爱自己的国家，青年时期他就关注国内的政治动向和时代潮流的变革，他拥护苏联和蒙古人民走上革命的道路，在白色恐怖下，通过党的地下情报组织向苏蒙军传递日本关东军的军事情报，粉碎了日本关东军蚕食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侵略计划。凌升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动足以表明了他反对外族侵略者的爱国立场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日本帝国主义对凌升等人采取镇压手段这是必然

的结果。从凌升的表现中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面对敌人的逮捕、监狱、酷刑拷问、法庭、刑场和即将来临的被杀，由于他胸中装着民族，所以他表现了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没有惧色，没有悲伤，有的只是仇恨和怒火。在狱中的关键时刻，他用满文为后人写下了珍贵的遗嘱：“我将被日本人杀害，是因为我保护地方各族牧民的利益，不愿做亡国奴，引起日本人对我的仇恨，但我死而问心无愧，请勿悲哀”。仿佛我们听到了凌升这位民族英雄面对敌人凶残的屠刀而发出的震耳欲聋的控诉和自由。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凌升事件”，虽然达到了牢牢控制呼伦贝尔的罪恶目的，但从根本上打破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它的幻想，进一步唤醒了各族人民的新觉醒，它预示了日寇的灭亡即将来临。

凌升在人生的道路上度过了整整五十年，这五十年在宇宙间也只是短暂的，但他给我们都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的历史上，虽然有局限的一面，但那只是他人生旅途中的暂短曲折，在他一旦认识到后，就翻然悔悟，改弦易辙，为了呼伦贝尔地方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他毅然决然，毫不畏惧，同异族的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使面对死亡，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最后他为祖国为民族英勇捐躯，这种可歌可泣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凌升不愧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一座丰碑，不可忘怀的爱国主义者，少数民族的杰出领袖和人民的儿子。在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時候，凌升的英灵永垂不朽！

一九九五年元月十七日

参考资料：

- 1、索日沙庆：《黑龙江民族丛刊·达斡尔族的著名爱国者凌升》。
- 2、《诺门罕战争》：厉春鹏（执笔）、徐占江、阿必德、阎为民、那申著。吉林文史出版社。
- 3、《凌升之死》：阿·恩克巴图，《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二辑。
- 4、《伪满时期的凌升事件》：额尔很巴雅尔，《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三辑。
- 5、《色布精太事略》：阿·恩克巴图、色尔森太，《海拉尔文史资料》第四辑。